

楊建墉

個人簡介

1924 年生於順德。少時就讀廣州市立五十八小學，中學時入讀香港培正中學和培英中學。1937 年，北上韶關，就讀南武中學和文理學院附中，後以工讀生身份入讀北江農工職業學校，並處理學校事務。離開北職後，投考中山大學工學院，後參加青年軍，駐守雲南巫家壩機場。1947 年回港生活，投身建築行業。

童年生活

我是廣東順德容奇人，1924 年生於家鄉。容奇有三大姓氏——關、陳和楊，後來我家遷往大良和陳村。因為父親的生意幾乎全在廣州，我大約三歲便移居到那裡。父親叫楊勁伯，為順德容山書院第一屆畢業生。因為他是庶母所生，畢業後便沒有升學。祖父死時把所有資產分給大伯父，父親後來獲得外公提拔，投資經營了十四間工廠，包括搪瓷廠、電池廠、牛奶廠、紙傘廠、骨粉廠、味精廠、光管廠、三間糖廠和三間通訊社，即時事通訊社、國際通訊社和國際電訊社。他同時也協辦了三間報紙館，有《現象報》、《公評報》和《環球報》。我還記得搪瓷廠在廣州南石頭，光管廠在沙面法租界，三間報館在光復中路，電訊社在連元街 12 號，而利豐糖廠、益豐糖廠和廣豐糖廠，則在順德陳村。

我家在廣州光復中路民安新街，那是條掘頭街，一邊有六間房子，全是四層高，另一邊是圍牆，圍牆後面是醬園。我沒有讀過幼稚園，三歲直接讀一年班，在廣州市立五十八小學讀了五年，然後就去香港。小時候，姑姐教我們讀書，在生活上也很照顧我們。她沒有結婚，和我們一起住。她也是容山書院第一屆畢業生。入學前，姑姐就教我《古文評注》，我讀過〈古戰場文〉、〈學解〉、〈長恨歌〉、〈琵琶行〉和文天祥的〈正氣歌〉等。她對我要求很高，若我背不到書，就拿裁衣尺來敲我的頭，所以我的古文根底很好。

小學時，我的生活很奢侈，家裡有三個女傭，全是家母結婚時帶來的。上學時，我坐在女傭的大腿上，由人力車拉我們回校。家中共有三輛人力車，大哥一輛，姐姐一輛，我一輛。那時家人會把我們兄妹的毛巾和白襯衫，拿去狀元坊的顧繡店繡上名字，以免調亂。我的衣物會繡上老虎頭，哥哥的就繡上龍，姐姐的則繡上鷹。我們從小就穿西裝和皮鞋，都不願意穿膠鞋，因為膠鞋會把腳弄臭。記得父親每月給我十二塊錢零用錢，在當時來說數目頗大，約為普通人家一個月的伙食。我很懂得花錢，會請同學吃東西或租地方開舞會。那時同學們的家庭背景差距不大，大家的環境都不錯。

我們要穿校服上學。五十八小學的校服是西式的，有灰色長褲和白色襯衫。學校也有女同學，我記得有一個叫邵瑞華，還有一個叫林妹妹。當時我的成績一般，考試通常有七十幾分到八十多分，但從來不超過九十分。我的理科，如算術、勞作等，成績比較好。別人的勞作技能是先生教的，我的卻是在自製模型屋時學會的。看來我很早便對土木工程有興趣！廣州的小學很死板，上課就是聽老師教書，放學後也沒有甚麼課外活動，我只能呆板地讀書。說真的，我很不喜歡那種學習氣氛，所以到了五年班，雖然小學還沒畢業，但我就去了香港。

香港求學

在廣州念完五年班，我跟隨大哥、姐姐一起去香港，不過父母沒有隨行。我們寄宿在舅父家中，記得那是在香港堅道 57 號 3 樓，樓下就是甄沾記。初到香港，我們住在佐敦道 8 號 4 樓，即佐敦道和彌敦道的交界。那時我還小，大哥安排我入讀九龍培正中學初一班。在培正的時候，我很頑皮。當時要在學校寄宿，晚上我偷偷走到平安戲院後面的廣智戲院看電影。當時看一場戲要五個仙，我們看的是默片，沒有聲音，不過有人解說。我們偷跑出去看戲，回去時須跳圍牆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翻牆過去時，有兩條大狼狗咬住我的腳，結果被校監抓到。培正的老師嚴肅古板，校長也很兇。當時有人編了

一首歌——「真光豬，嶺南牛，培正馬騮頭，培道小姐滋油油，道群雞仔竇，¹遠東專索油。」²它講的是學校的校風，例如培正學生比較像猴子；官湧的道群中學校徽上有一隻紅雞，所以叫雞仔竇；遠東學生很有錢，但很「飛仔」，³上學不穿校服，看起來很隨便。

我不大喜歡培正的校長，所以初中二時便轉去培英中學。培英在列堤頓道那裡，其格局跟培正差不多，戰後我還幫過培英重建了聽松樓、校友樓和大禮堂等。讀完初二，大概 1937 年，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，我們和大哥、姐姐又回到內地，去了韶關求學。

北上韶關

那時廣東時局不好，爸爸讓我們回內地讀書。記得三叔帶我們坐佛山號汽船，從香港到廣州，又從廣州沿北江，經蘆包去清遠，再走路到韶關。當時清遠接近日本人的封鎖線，我們須連夜偷渡，沿途又聽到冷槍聲。我們跟著導遊走，有時候要俯臥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否則就有人放槍，情況很危險。當時我的行李很簡單，只有一個籐書包，內有一套內衣和外衣、一條手巾、一對襪子、一條毛巾、一隻牙刷，以及婆婆給我的十元港幣。母親又為我做了一條縐紗帶，把家人給我的錢（當時是用小洋而不是大洋）藏在褲頭帶內。我記得走了六天才到韶關，因為白天不敢行動，只能夜晚走，所以花的時間較多。

那時韶關有兩座樓，一座叫風度樓，另一座叫風采樓。三叔在風度路開了一家鋪子，專賣針線、洋巾、鞋襪和手巾等小物品，父親寄錢就寄到那裡去。到韶關後，剛好南武中學和志銳中學招生，南武取錄了我，於是我去那裡念書。學校在西河壩沙梨田搭建了竹棚作課室，那時的主任叫陳語山。後來因為一件事，我離開了南武。

¹ 竇為廣東俗語，指窩。

² 此歌曲有不同版，如「真光豬，嶺南牛，培正馬騮頭，培英咕喱頭，培道女子溫柔柔」、「真光豬，嶺南牛，培正馬騮頭，培道女子溫柔柔，培英苦力頭，嶺英太子公主遊」等。

³ 飛仔為廣東俗語，指流氓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，當時父親託人帶了一張支票給我，剛好有位同學遺失了一張支票，銀行和款額跟我的一樣，同樣是五十元。陳語山主任認為我偷了同學的支票，我非常氣憤，決定離開南武。說起來，戰後我在香港還偶遇過陳語山先生，他的手指畫在當時很著名。那次相遇，他認得我，還當場向我道歉——原來那位同學後來找到了支票，證明我沒有偷過。離開南武後，我住在十里亭靖村。那裡要抽壯丁當兵，我們二十三個外地人全部中標，但當地人一個也沒被抽中。我很不滿，又離開了十里亭，回到韶關。

回韶關後，我入讀了連縣東陂的文理學院附中。當時勸勤大學的文學院和理學院已遷到連縣，附屬中學在那裡搭建了一個大竹棚，繼續辦學。文理附中是相當好的學校，師資不錯，大哥和姊姊在那裡念高三和高二，我則念初二。在文理附中，我認識了李漢魂的大兒子李敢，他是李將軍原配夫人所生的，個性很活潑。他是我的同班同學，大家都很有頑皮，所以很快便相熟起來。當時學校規定不准賭錢，但李敢租了一個炮樓，在樓頂打麻將，地方官走上來，他就在炮樓上鳴槍。那根短槍是他母親給他自衛用的，他竟帶著它上學。讀完初二，文理附中便撤離連縣，我不想跟著走，就離開學校了。

創辦北職

離開文理附中後，我又回到韶關，晚上在廣東省財政廳刊印稅票，那時財政廳長是謝恩隆先生。後來我又遇上楊壽宜先生，他是我九叔，當時任職北江農業工業職業學校校長。他從前在勸勤大學辦教育，後來在廣東省教育廳工作，當時教育廳長是黃麟書。那時大哥已回順德，姊姊跟著舅父張知庭到了廣西師範念書，舅父曾是《華僑日報》的總編輯。姊姊後來在桂林認識了姐夫鄭先生，他戰後在香港創辦了《快報》，前後經營了十九年，後來因為身體不好，才結束報紙，不過這是後話了。

當時在韶關，九叔見我無依無靠，就跟我說廣東兒教院有不少中學程度的學生，離開兒教院後沒有一技之長，很難謀生，所以想在北江辦一所農業工業職業學校。經他一

說，我就跟著他到羅家渡籌備北職，羅家渡離湖南坪石約有三十公里。

我們在羅家渡找了一間大祠堂，和鄉長商量後，建議優先取錄當地的孩子到北職讀書。鄉長同意後，我們便在祠堂辦起學來。從那時起，我就跟著楊壽宜，一起籌辦北職。由於條件有限，學校設備非常簡陋。上課時，我們坐在石級上，把一塊木板放在膝蓋上，當成桌子，在上面寫字。那時我是自費生，不是拿公費念書的，所以須要「以工代賑」，即以勞力代替學費、書本費和食用費。於是楊校長讓我獨力承擔一切庶務，如學校的伙食和衣服鞋襪的分配工作等，他主要負責行政和收生事宜。

當時學校最缺乏肉食，我想到可以上山打獵，打到野味，跟師生分享。我還自己種菜和養羊，希望大家都有肉吃。記得有一次，我買了一頭牛，有九百多斤重，但我們不懂宰牛，於是我向牛頭打了一槍，但牛沒有死，還跑到河邊。我們幾個同學，只好跑到對岸把牛殺死，將它割切成若干分，再運回學校，想來也真有趣！一般來說，我們的伙食，主要是飯和蔬菜，每月大概可吃四次肉；如果打到野味，則會加菜。

此外，那時運送糧食也很困難。我們要走三十公里路到坪石，在那裡領取一個月的米糧，再由同學運回學校。我覺得這樣很辛苦，就向九叔提議以水路運送糧食。當時我和一位姓羅的庶務，把山上的樹幹鋸成木板，製造了一條船。我們請人每月把船由羅家渡駛到坪石，然後在水漲時，把一個月的糧食從水路運回羅家渡。當時除了我，就沒有人敢開這條船，因為它很難控制，而且航道變化大，水道又窄，控制不好的話，船很容易就撞散。每次運糧，我都在船尾把舵，另一人在船頭幫忙。這個方法解決了運糧的問題，我們自此不用從陸路運送糧食，全校同學都很高興。

說起北職的經費，第一筆是吳菊芳撥來的，約幾千元，主要用來買書和炊具。然而，學校日後的常費，則由楊校長募捐回來。他曾請求政府撥款，但財政部沒有撥出固定經費，因此學校須自負盈虧。李漢魂曾經巡視學校，他的長子李敢當初都在這裡讀書。至

於師資，它由教育廳分派，但老師的名字，我大都記不起來了，現在只記得有個叫李祥楷。此外，很多勤勤大學工科老師都曾任教過北職，教材也是他們帶來的，內容很艱深，我們學起來，非常辛苦。

說起來，北職是以學習為主的學校，沒有辦過工廠。農科是學耕種和培育，工科是學土木工程，但機械、電機和無線電則沒有學。那時我們學土木工程，先從地基開始學，後來學到工程力學、風力學、水力學等。北職第一批學生，有來自兒教七院的，也有來自三、四院的，幾乎每個院都有學生來念書，不過都是三三兩兩的。那時有些同學不喜歡讀農工科，想考力行中學。入讀北職前要通過面試，主要是見見面，問問志願，例如問喜歡農科還是工科等。然後根據面試結果編班，記得第一批農科和工科的學生，有三、四十人，當時全校師生共百多人。後來也有些力行中學、志銳中學和實驗中學的學生報考北職，因為他們對農科和工科有興趣，加上入讀北職不須考試，只須面試，所以報讀的同學越來越多。

在北職讀四年便畢業，資歷相當於在其他學校讀六年。那時候同學們都很用功，能夠畢業的同學皆很聰明。因燃料供應緊張，我們沒有錢買燈油，所以很少在晚上看書，多數在早上起來溫習。學校有大考和小考，楊校長要求嚴格，若考試不及格便要留班。陳瑞顏是第一屆畢業生，她離開香港去美國的時候，我還送了一對錶給他們夫妻倆。

至於兒教院開辦的工廠，如織草鞋和製造牙刷的工廠，以及兒教院的工藝院和農藝院，皆與北職無關，大家屬於不同體系。當初開辦北職，是為了讓兒教院的同學有一技之長。雖然北職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兒教院，但它是獨立的學校。

最後，我並沒有在北職畢業，因為我犯了一個錯誤。事情是這樣的，當時有個女同學叫杜賽紅，她發冷發得很厲害。患病同學本應每天吃兩次藥，但校醫楊醫助認為藥物供應緊張，故此只給她吃一次，因為這樣可以讓更多患瘧疾的同學有藥可吃。我認為他

的醫德不好，晚上便打開藥櫃私自取藥，把冷發丸分給每一個患瘧疾的同學吃。校長知道後，便說：「你不要以為是我的侄兒，就可以胡作非為，我一樣不給你面子。」於是，我被停學半年，半年後才可復學。

加入青年軍

停學期間，我回到坪石，考入中山大學。當時中大文學院和工學院在三星坪，我考入工學院讀土木工程，後來在國立中山大學畢業。和平前一年，國民政府發起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。我和很多同學響應，一起投考青年軍，獲編入二零九師六二五團第三連。我被派到雲南駐守昆明巫家壩機場，那時陳納德將軍的十四航空隊總部就在巫家壩，我也坐過他的飛機。

我們是機場衛兵，責任是保衛機場。那時新一軍分為青城部隊和英城部隊，我們英城就是地面步兵，而青城則是降傘部隊。我們配備了卡賓槍和美式裝備。後來日本仔轟炸昆明，⁴我們從雲南騰沖打通史迪威公路，一路去到緬甸的臘戍，然後再回到雲南。我曾經帶領一連人去作戰，但最後只剩下七人。那七個人，除了我，還包括中山大學金曾澄校長的兒子金寶樹和金寶幹。

重回香港

和平後，我們去了福建整編和駐紮，後來一部份人上東北打共產黨，一部份撤退至臺灣。我決定不當兵了，把手上僅餘的四十元大洋券，兌換成二兩七錢金，然後回去香港。那時父親在廣州的工廠全被解放軍沒收，十四間工廠只剩下利豐糖廠。利豐糖廠即現在容奇的沙頭糖廠，專售流花牌白砂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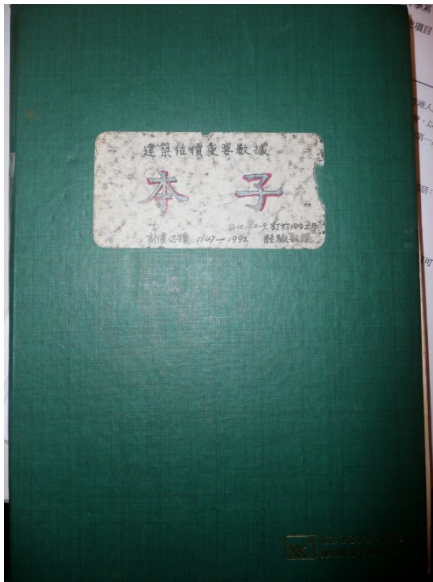
1947 年，我回到香港，住在駱克道 131 號。後來那座樓房，因太舊而倒塌了，導致

⁴ 抗戰後期，日軍南侵，美國協助中國修建史迪威公路，作為南面的交通動脈，以運送來自越南、緬甸等地的戰時物質。後日軍進侵緬甸，中斷補給線；中國派孫立人的新一軍，打通這條大後方的補給線，展開了「滇緬大戰」。

我失去所有證件。於是，我從地盤工做起，一切重新開始。我從平水做到助理管工，再升至總管。因為香港政府不承認內地大學的學歷，於是我重新讀了四年書。書中的知識，我已經讀過，所以我會幫幫同學，教教他們。最後，我拿了一張文憑，也轉到寫字樓工作。



楊建墉 (2014)



楊先生珍藏的工程筆記 (1947-92)